

与一位汉学家 有约

孙 博（加拿大）

第一次听说日本汉学家渡边晴夫的大名，是在2015年。那年底，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郑宗培先生，推荐我担任第三届“武陵国际微小说节”的嘉宾。

12月中旬，我从加拿大飞到上海，然后再与郑宗培一起去湖南常德。在候机室里，郑宗培兴致勃勃地与我聊起微型小说，他说“微阅读”时代生活节奏加快，微小说可以“短平快”地反映现实，已成为海内外读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他知道我近年忙于网络电视台的创业，没有时间从事大部头的创作，所以希望我能抽出零星时间写微型小说，并强调分寸之间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当场答应，考虑试写一些微型小说。

那次促膝谈心，郑宗培还郑重提及日本的渡边晴夫教授，说他是“中国通”，十分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学。渡边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孕育日本文化起了巨大作用，他要用自己的努力，让日本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渡边还是小学四年级时，一本《三国演义》让他迷上了中国文学，从此逐步成为汉学家。渡边非常喜欢鲁迅先生的作品，他说鲁迅的作品寓意深刻，但比较难读，他是在上大学时靠着查字典才读完了《狂人日记》。渡边还十分喜欢“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的作品，并对此作了大量研究。《孙犁与鲁迅》《孙犁与古典》等在日本文坛影响深远的论著，均出自渡边之手。郑宗培还说，渡边最近十多年来发现中国微型小说异军突起，又致力于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微型小说，渡边也是中日微型小说最早的研究者、推动者，研究成果累累。

2016和2017年我只写了两篇微型小说。2018年起我正儿八经地进入了微型小说创作阶段，从此一发不可收，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多篇微型小说，还获了好几个奖项。在多项征文比赛的评委名单中，总可以见到渡边晴夫。那时，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希望有朝一日能当面请教这位游走于中日文坛的老人。

2018年底，我的微小说《蹭饭王》获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奖二等奖。我因故未能去印尼雅加达领奖，文友传来现场大屏幕照片上显示，给我颁奖的嘉宾正是渡边晴夫先生。与先生失之交臂，我实在感到惋惜。

谁知到了2019年底，我的微小说处女作《归来来兮》突然登上了日本的《莲雾》文学杂志，令我喜出望外。这也是我的第一篇日文版作品，颇有纪念意义。《莲雾》由日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办于2005年，每年一期。翌年底，我的微小说《肥仔明双喜临门》再次登上了《莲雾》。渡边长期担任日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该会专门研究、翻译各国华文微小说，成员都来自日本各大大学的教师，其中不乏著名的汉学家。像渡边已年过八旬，还在坚持翻译，令人敬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两个女儿渡边奈津子、渡边明子也培养成汉学家。《莲雾》是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微型小说作品的一个最好窗口，渡边也曾任《莲雾》主编多年，由此看来，我与先生还真有缘分。与他老人家见面的愿望又加深了一步，也促使我全方位关注他。

先生的一生与中国文学有缘。他于1936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东京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毕业。先后于名古屋外国语大学、长崎大学、东京大学等校任教授，致力于中日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直到70多岁才退休。

退休后又到多所大学做短期教学或开设讲座，内容包括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中日比较文化。在微型小说研究方面，渡边先生撰写了多部有影响的专著，如《日中微型小说比较研究论集》《微型小说：发展与交流》等。而先生的《超短篇小说序论》，被学术界称为“中日微型小说研究的里程碑”，填补了中外关于微型小说演变发展史尤其是中国的微型小说、日本的超短篇小说文体发展史的空白。一部著作可以同时填补两国文学学术史各自的空白，既需要作者的独具慧眼，也需要长期不懈的研究。

近闻87岁高龄的渡边晴夫先生抱恙静养，我在遥远的加拿大祝他早日康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研究还有不少课题值得先生指导后生开拓。我与先生有一个美好的约定——我们一定会见面！届时，当面向先生表达多年的敬意与感谢。



樱花盛开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守望五条岭

徐向林



清晨，几颗星镶嵌在黛青色的天幕上，料峭春风轻拂着宁静的村庄。卞康全一如往常，早早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小院里，84岁的老父亲卞华已推出一辆独轮车在等他。车上载着昨日新取的泥土，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泥土味儿。父子俩默契地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出发时，卞康全接过独轮车在前面推着，父亲扛着两把大锹在后面跟着。十几分钟后，父子俩来到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镇五总河畔的五条岭烈士陵园。在巍峨的烈士纪念碑前，两人停下脚步，放下大锹和独轮车，不约而同地整了整衣容，先是对着烈士纪念碑三鞠躬，而后站直身躯肃立在纪念碑前。借着微弱的晨光，卞康全高声地诵读碑文，卞华则认真地侧耳聆听。

碑文复制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父子俩对碑文早就烂熟于心，但每次诵读和聆听，他们依然会有新的感受。

盐城东临黄海，大片土地是向海生长的泥质滩涂，这也使得盐城成为全境没有一座山的低海拔城市。

然而，一场血雨腥风的战斗，却让平原上耸起了“高山”。

时光回到1947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派13000多人从东台北犯盐城，我华东野战军第11、第12纵队所部会同地方武装，在盐城东南的伍佑、便仓一带对敌展开阻击。战斗异常激烈，这场阻击战，史称“盐南阻击战”。此战中，我军取得辉煌战绩，消灭、俘虏国民党军7000多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也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

战火硝烟中，当地百姓通过船载人抬，将烈士遗体送至主战场附近的伍佑区袁坎乡港南村（今步凤镇庆元村）一块空旷的盐碱地掩埋。卞康全的祖父卞德容当年参与了烈士遗体的安葬，亲眼目睹了安葬烈士的全过程。由于牺牲的战士太多，加之战争频仍，无法一一给烈士建坟，当地百姓只能在平原上挖沟，以叠葬的方式安葬烈士。

一条沟，两条沟，三条沟……大伙儿一边流泪，一边不舍昼夜地挥舞镢头、铁锹挖沟，共挖出5条横贯东西的长约40米的土沟，堆起了1米多高的长长坟头。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远远看去，恰似一道道耸立的“山岭”，当地人遂将此处命名为“五条岭”。

烈士安葬后不久，在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下，陵墓局部坍塌。家住陵园附近的卞德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冒着风雪前去修墓。自此后，他自发地当起了烈士陵园的守墓人，并花费了10年时间，终将陵墓稳固住。

自卞德容起往下数，卞康全已是五条岭烈士陵园的第三代守墓人。

1967年，卞康全出生时，他的祖父卞德容已因病去世了6年。“在我稍稍懂事时，我脑海里打满了问号，为什么我家附近会有5条山岭？为什么父亲总在那里忙碌？”这是卞康全日记上记载的一段话。他的这些问号，从母亲程庆莲那儿得到了答案：“那不是山岭，是陵墓，下面埋着很多革命烈士。你父亲在那儿忙碌，就是护陵守墓。”

自从卞康全知道五条岭是烈士陵园后，就对五条岭格外留心起来。他看到父亲卞华每天总要扛着大锹、扫帚去陵园转一转，拔草、添土、打扫，日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不间断。特别是逢上阴雨天，父亲更是整天守在陵园，常常忙到天黑，才一身泥水地回家。卞康全也想跟着父亲去，父亲看了他一眼后说：“等你长大了，再去。”

这时候，小草出场了。这算不得美人计，军臣单于的意思不过是，我也不杀你，但你还得忘记你那所谓的外交使命，就安心在这儿过日子吧。

身为俘虏，张骞没有太多的选项。对小草来说，她能拥有的选项可能比做俘虏的张骞更少。两个命不由己的人只能走到一起。

青青草原，大漠荒沙。张骞不得不按下使命，生儿育女。这一晃就是10年，看管他的人认为他肯定早已被同化，了无异心，便懒得过多理他。这却为他的逃跑创造了条件。

这天，他和他的随从收拾行装，像每天正常外出打猎一样做着准备。这个时候，其实只有小草知道，他们分别的时刻真正到来了。她不想把事情挑明，是因为她还没做好随他而去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相濡以沫10年，张骞也未向她挑明，说明他也并没有就此带她远走的打算。她只默默给了他一个拥抱，仿佛是想把曾经的10年留住，

业鞠了一躬，然后带着陈继业上坟。面对5条长长的坟岭，无法确认陈同桂到底埋在哪个岭下。陈继业给每条岭都添了三锹土，边添土边抽泣道：“爸爸，女儿来看你了。”陪在一旁的卞康全也不断抹着夺眶而出的泪水。

可是，陈继业之后，等来的烈士亲人还是很少。到了2009年，事情出现转机：当地政府对五条岭再次进行了翻新修整，正式聘任卞康全为“五条岭烈士陵园守墓人”。并组织人力物力四处收集盐南阻击战的有关信息，汇编成《难忘五条岭》一书，书中收录了751名烈士的名录。

正是这本书，使得卞康全帮烈士寻亲有了依据。他结合书中的信息，并通过走访烈士籍贯地的党史部门、民政部门等收集到信息，不停地给烈士的家乡写信寄信，联络烈士的后人。这些年，卞康全已写出900多封信件。政府发给卞康全的补贴，大部分被他花在邮资和外出寻找烈士后人的差旅中。

对此，卞康全的妻子唐兰女不仅毫无怨言，还在农闲时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她常对卞康全说：“你为国守墓，我为你养家，都活得有价值。”

在通信中，卞康全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难题：由于很多地名变更，导致信件“原址查无此人”。

早期，卞康全收到的退信很多。可从2019年开始，退信突然消失了。怎么回事？细心的卞康全一查访，却查访出一个让他倍感暖心的事：邮政公司的投递员们得知卞康全为烈士寻访后人的事迹后，自发地加入这一公益行动。地址不清的信件，他们一次找不到就二次，二次找不到就三次。经过努力，许多本应退回的信件找到其接收人。其中，卞康全寻找孙汝同烈士后人的信件，投递员就花费了两个多月时间查访。

孙汝同烈士籍贯盐城阜宁县，他原先居住的村子叫“申家墩”，投递员怎么也找不到。后在阜宁县党史办的帮助下，才得知申家墩几十年前已改名为长胜村，卞康全寄出的信几经辗转，终于投送到孙汝同烈士的侄子孙少国手中。

展读这封信后，孙少国老泪纵横。孙汝同是孙少国的二伯，于1945年参军，生前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第84团战士。孙汝同参军离开家乡后，因部队随时转战各地，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自那以后，“失联”的孙汝同成为父母的一块心病。然而，历经多年查找，一直苦无音讯，其父母也带着失望先后离世。

收到信后，孙少国随即带着家人乘车来到五条岭烈士陵园祭奠，而这天正是孙汝同烈士的百岁诞辰纪念日。

除写信联络外，卞康全还自备记事簿，详细登记陵园每一位来访者的信息，包括名字、来自哪里、联系方式等。他会告诉来访者，其家乡有哪些烈士安葬在这里，让他们

小草

张世勤

或是把曾经的10年还给他。

既然好不容易逃出来，按说，他们应该往东跑才是。没有！他们恰恰选择了向西。也就是说，10年过去了，张骞揣在怀里的使命火把，依然在熊熊燃烧，将心空照得锃亮。使命在，干劲就在。不管戈壁，不管飞沙，不管风雪，他们过车师，越焉耆，溯塔里木河，穿疏勒，翻葱岭，至大宛，然后继续一路向西，掠康居，走大夏，终抵大月氏。可历经千难万险的抵达，却并不代表着成功，因为10多年过去，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大月氏，此时已经放弃了抗击匈奴的打算。落寞回返的张骞使团，放弃北道，改从南道，沿昆仑山一线向东，为的是能够避开匈奴的势力。但却没想到，曾经独立的羌人地区早已沦为匈奴附庸。他们只能再次成为匈奴人的俘虏。

这个结果是小草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之间的缘分注定已经结束了，当初分手时的



她只有性别，没有姓名。无名无姓的人在史书中很常见，于我的读史习惯，并非关注大事件之后拔腿就走，而尤为喜欢历史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往往他们的故事，更令人唏嘘动容。

公元前138年，张骞从长安动身的那一刻，远在千里的她尽管全然不知，但其实她和他的命运纠结已经开始了。司马迁为什么不肯记录下她的名字，原因不得而知。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先临时给她取一个，比方说小草。毕竟她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那么她理所应当是其中的一棵小草。

汉武帝时的汉王朝已经很强大，但此时的匈奴也很强大，要想穿越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个小国，联络最西端的大月氏，进行两面夹击，策略正确，只是实施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不，张骞一行刚进河西走廊，就被匈奴的骑兵抓了个正着。啥也别说了，押往王庭吧。